

黔中城市史

——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

范松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中城市史

——从筑城溯源至近代转型

陈明才 著

黔中城市史

——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

范松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 / 范松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1-10517-2

I. ①黔… II. ①范… III. ①城市史-贵州省-近现代 IV. ①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223 号

黔中城市史

——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

范松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0517-2 定 价: 39.00 元

黔中城市史

——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

范松 著

第一章 黔中的自然地理与城镇萌芽

13

第一节 黔中地区的历史沿革与自然环境

13

一、黔中地区的历史沿革

13

二、黔中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18

三、黔中地区的城镇萌芽

22

第二节 史前文化遗址与早期人类聚落

23

一、黔中地区的史前文化

25

二、黔中地区早期人类聚落

30

第三节 黔中城市的萌芽与社会背景

35

一、城市萌芽的早期阶段

35

二、早期聚落向早期城镇的演变

37

三、早期城镇的早期发展阶段

40

四、早期城镇的早期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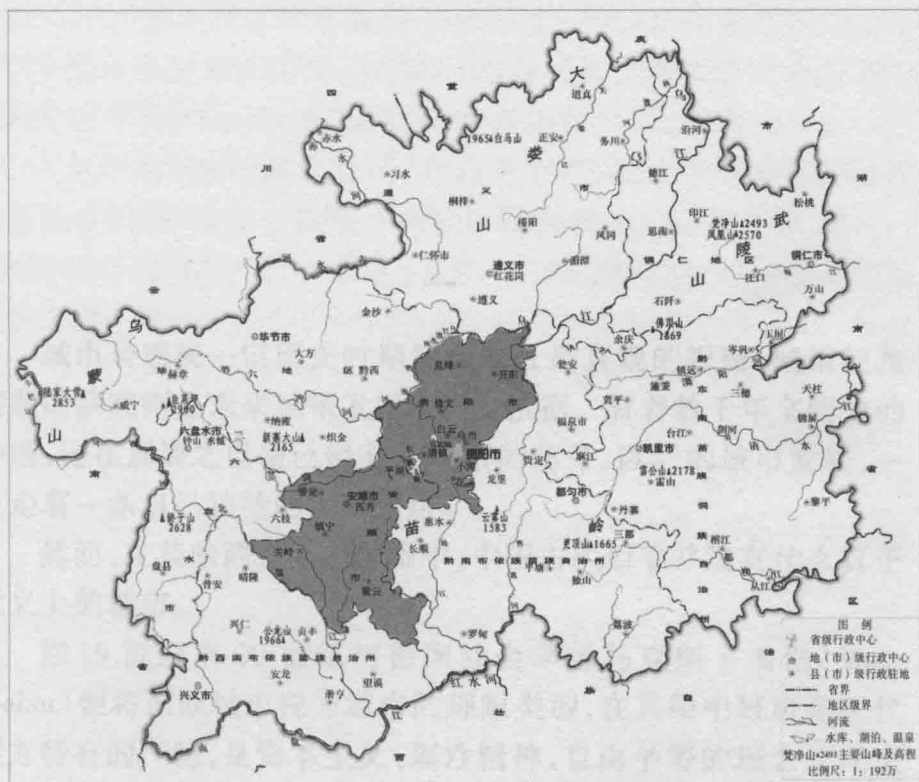
43

五、早期城镇的早期发展阶段

62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中在贵州省位置示意图



黔中在历史上是一个动态地域概念。据有关文献记载：战国时“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地方五千里”，曾被楚、秦两国反复争夺。秦统一六国后设置的黔中郡，较战国时小。唐朝时曾设黔州、黔中郡，黔字作为地名频繁出现。以后，黔逐渐成为贵州省中部地区的代名词。今日的黔中，主要指省会贵阳市和安顺市管辖地区，即贵安地区。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黔中的自然生境与城镇萌芽	15
第一节 黔中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自然生境	15
一、黔中概念的历史演变	15
二、黔中地形地貌的基本特征	18
三、黔中的地理生态环境观察	22
第二节 史前文化遗址与早期人类聚落	25
一、黔中地区的史前文化	25
二、黔中地区最早的人类聚落	30
第三节 黔中城市的萌芽与社会背景	36
一、城市问题研究的不同视野	36
二、今贵阳辖境的早期沿革与城邑萌芽	37
三、安顺等地的早期沿革与城邑萌芽	50
四、通道地位与遵义早期历史沿革	55
五、其他与黔中紧邻地区的历史沿革	63

第二章 明代的边疆开发与黔中城市的奠基	67
第一节 明初治黔方略对黔中经济发展的影响	67
一、明代的治黔方略	69
二、贵州高原的城镇建筑之风	78
第二节 黔中城镇中心地位的奠基	82
一、贵阳府城中心地位的确立	82
二、安顺城在明代的发展与兴盛	94
三、明代黔中地区的其他城镇	104
第三章 清代黔中城市的发展	117
第一节 处于社会巨变下的黔中社会	117
一、清政府平定“三藩”对黔中社会的影响	119
二、黔中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	123
三、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演变	125
第二节 清代黔中城市的扩容	130
一、贵阳府城的逐渐完备	131
二、安顺府城在黔中的迅速崛起	141
三、黔中城市群的形成	148
第三节 清代黔中城镇的经济社会状况	165
一、清代黔中的农村经济	165
二、清代黔中的交通与工矿业	178
第四节 外来文化的介入对城市的影响	184
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	185
二、城市的反帝浪潮与黔中“教案”	191

三、外来文化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	194
第五节 黔中城镇的近代化准备	201
一、近代工业的试验与早期近代工业的出现	202
二、商业的活跃与新兴行业的出现	207
三、社会团体的出现与政治变革的酝酿	213
历史文献中的黔中城镇演变	220
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	258
后 记	264

导 论

城市是透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变迁最直观的视窗,城镇起源问题的研究则是未来城镇发展的历史依据。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还在夏商之世便已经有了城市的萌芽,以后的城市发展,一直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某些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古代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便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在其眼中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①。

事实上,中国城市起源的研究起步很早。《洛阳伽蓝记》、《长安志》都是古人对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20世纪30年代,梁启超先生发表的《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章,更是近

^① 熊月之:《中国城市史:枝繁叶茂的新兴学科》,《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9日。

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的起步^①。但其后虽继续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研究专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才又重新掀起一股城市史研究的热潮。

相对说来,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城市史研究的确是相对滞后的领域。虽然学术界有不少人将关注点投向城市发展问题上,“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②,但显然仍有许多不足。

近30年来国内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不少,仅1986—2006年间,发表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历史专业期刊中的城市史及相关研究文章多达数百篇。这一时期,关于城市起源与特征的专题研究逐渐深入。在古代城镇起源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观点,对古代城市选址、规划布局、特点与分类等问题的探讨也较为深入。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发展史的论著却不多。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研究中国城市史,如果只着重选择某些历史时段,只将着眼点聚焦在如江南这样的相对发达地区,势必很难厘清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道路,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起源、类型、特征科学总结。

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史研究的文章面世,如王雅红的《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研究》^③;杨天姣、杨慧的《呼和浩特城市空间演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城市史研究》^④

①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发表于1926年10月《晨报》7周年纪念增刊。

②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③ 《中国西部》,2011年15期。

④ 《城市建设》,2011年第11期。

等,但关于云贵两省城镇史研究的论著却极少见。《贵州城镇》编委会编的《贵州城镇》一书^①,可视为最早关于贵州城镇史研究的论著。1997年出版的《近代昆明城市史》则是对云贵地区单体城市史研究的首部著作。此外,似乎没有再发现更多新的出版物。已发表的一些论文,往往局限于对民族地区早期集市考察。如卢勋、万红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市场的起源与历史形成》^②;《论西南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历史形成》^③等。这些文章专题性较强,涉及贵州城镇起源的内容却不多。

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探索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历史借鉴。这也正是作者选择“黔中城市史”这一论题,以之作为对象来剖析贵州高原城镇历史发展状况的原因。

二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推而广之,则一方人造就出一方的历史与文化。古希腊时代,一种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的理论开始萌芽。其后被称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论点影响深远,到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mon - y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甚至提出不同气候的特点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有着决定的作用。这种论点,18~19世纪的流行是有进步作用的,它至少在反对宗教神学和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性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但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人们通过理性的分析,逐渐认识到,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存在

① 贵州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②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4月。

③ 《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与社会发展中经常的、必要的外部条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视,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它的作用与影响,最终受社会生产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制约。因此,在讨论区域经济及近代城市发展的问題时,既需高度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又不能唯地理环境而论。

贵州是一个高原山地省份,它的地形地貌不仅在中国,即便在同属于青藏高原延伸带的云贵高原,也是极为独特的。这个山峦起伏,绵延纵横,国土面积的61.9%为喀斯特地貌所覆盖的省,不仅因诸多古生物化石群的陆续发现,被视为地球生命的源头,更因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而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

古人类的劳动、生息、繁衍绝不可能是单个个体,为了保护自己,那时的人们无疑必须以群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这种聚集栖息的群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聚落。

最早提及贵州高原人类邑聚的论著是汉代史学大师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关于汉代西南地区民族政权及相关经济状况的记述,其文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魑髻、耕田、有邑聚。”据此,我们所能确定的贵州高原的人类聚落究竟有哪些呢?目前能感知道的至少应包括夜郎古国的都城、它的旁小邑及秦汉王朝在夜郎境内设置的郡县治所。

问题在于黔中虽在古夜郎国的辖境内,夜郎的政治中心究竟在何处,迄今仍是一个悬念。

历史上的“黔中”,是一个动态的地域称谓。战国时,今贵州省沿河到榕江一线以东,包括铜仁地区和黔东南自治州的一部分县,均属于“黔中地”。这可能是“黔”这个称谓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仍在这一片地区设立黔中郡,不过,面积不如楚国的黔中郡大。唐朝时,在今贵州境设黔中道,建黔州郡和黔州都督府。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以黔州都督府为军事依托的黔中道兼领50个羁縻州。虽仍然以今四川彭水为

治所,但管辖的主体却主要在今贵州地区。

今天我们所说的黔中,广义上可包括以省会贵阳市、安顺市为中心,加上遵义市区、龙里、贵定、惠水、福泉、瓮安、黔西等县片区。这一地区不仅是贵州高原的腹地,更是影响和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板块。按国发(2012)二号文件精神构建发展中的,以贵阳、安顺两市辖境为板块的贵安新区,则是当代意义上的黔中经济区概念。

就整个贵州高原而言,黔中其所以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核心城市的聚会地,绝不仅仅因为它居于贵州高原的腹心地域,更受着地理、历史、人文因素的影响。是若干种综合条件交织在一起,经历长达数千年的社会浪潮筛淘后,自然形成的。单就地形地貌而言,黔中地区便集合了全省几乎所有的特征,近乎于一种贵州高原精粹地形地貌的浓缩。这在黔中城市与发展的历程中,无疑至关重要。

今贵阳市是黔中地区的腹地。撇开早期的城市萌芽不论,到了唐代今贵阳境辖地已有许多市镇刍型。其中的矩州,五代时被乌蛮首领罗氏主色率军占领。盘据贵阳地的谢氏被逐,旧有的城垣被毁,更名为黑羊箐。主色令其子若藏驻守石人山以镇矩州。是时的矩州虽系土城,但已具相当城市规模。北宋时普贵以矩州向宋王朝表示归顺,宋太祖赵匡胤的《赐普贵敕》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于是,矩州有了“贵州城”的称谓。元朝为加强对于今贵州地区的统治,改贵州城为顺元城,将城市规模相应扩大。在宋代土城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建筑。是时的贵阳俨然已成黔中首邑。

安顺作为黔中的另一重镇,素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先秦以前的安顺地区,领属上与贵阳地区近乎完全一致。秦推行郡县制初,今市中心区属象郡夜郎县,之后,夜郎国强盛,遂在夜郎管辖之下。魏晋之际,先属诸葛亮所设七郡中牂牁郡之夜郎县,南中

之战后属罗殿国治下。隋到唐朝初年一度为东爨势力所占据,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望江县,隶于琰州。唐宋时期,安顺杨武大寨为乌蛮普里部治所。元朝时,普里、普东两部归附,元以其地置普定府,治所仍在杨武。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置普定县,同时置安顺州,州治设于今旧州镇。当时的安顺州、普定县辖地均在今安顺市西秀区境内。安顺作为黔中中心城市之一的定位,于此时逐渐形成。

三

毫无疑问,当代城市是近代城市发展的成果,近代城市又是古代城市的延伸。因此,无论对于城市的起源迄今还存在多少种不同看法,我们都只能认为:城市是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固态化的文化成果。

明清时期不仅是黔中城市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更是贵阳作为贵州全省首府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明至清前期的470余年,贵阳作为省境内的中心城市,经历了超越其他省会城市发展速度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贵阳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确立以后,受到中央政府的格外关注,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封建中央王朝在这一时期里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经营的力度。

明初的贵州高原仍无省一级的独立行政建置,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实际为上述三省毗邻的边地。但恰恰因为这一原因,突出了贵州高原在整个国家政治与军事上的权重。而黔中又是贵州高原的心脏。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直接牵涉到国家西南版块的发展前景,是明代中央政府能否腾出手来推行治国大计的前提,也成为其后明政府决定将贵州设置为行省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以后,括起了一股强劲的修

建城镇之风。根据明(万历)《贵州通志》的记载,从明初至明神宗万历年间,贵州一省共建城43座。其中,除省城贵阳系在两宋时矩州(贵州城),明代顺元城基础上扩建外,其余42座城镇大部分为兴建。这是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同时也是贵州城市发展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

从贵阳、安顺两座黔中核心城市在明代的发展情况来看,每座城市都是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在当时还相对封闭的贵州高原,它们除具有政治军事中心的价值外,同样代表着省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和窗口,一定程度上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表现出来的聚集功能、扩散功能和创新功能,反映和代表着贵州省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到清代前期,黔中城市的发展步伐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状态。鸦片战争前的196年(1644—1840),不仅是贵州历史上变革剧烈的时期,导致了贵州历史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也是以贵阳、安顺为代表的黔中城市,作为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崛起的重要发展阶段。“三藩之乱”平定后,统治者在贵州推行“与民休息”政策,贵州的经济得以复苏。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于是到了雍正年间,统治当局在明代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场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通过改土归流与“苗疆六厅”的设置,铲除了封建领主经济在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这一切对黔中城市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经过明清两代的多次增建与完善,到19世纪中叶,坐落黔中腹心的府城贵阳,已成为一座足堪代表贵州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制约全省的中心城市,在城市规模、建筑结构、建造工艺、交通能力、商业市场等方面,都接近或达到了同一时期周边省会城市的水平。安顺地区城市的发展,则得益于内地入滇必经之咽喉这一区位优势,又与省会贵阳毗邻,受到封建王朝高度重视,在政策上、经营投入上都较省

境其他地区为多。尤其大量屯军、工匠、军户家属的成批迁入,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力,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这一切不仅加快了府属地区城镇建设的速度,更密切了安顺地区与贵阳府属辖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进而推动黔中成为全省经济最繁荣,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及带动力最强的地区。

四

当19世纪中叶欧美城市化进程已经十分强劲时,清王朝的统治者还沉浸在中世纪残梦之中,那种天朝上国的观念依旧盘踞着帝王和大臣们的意识结构。这种闭塞和无知,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黔中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启动,必然变得更加艰难。

黔中城市的近代化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样经历着城市转型,由专制主义统治下主体性质仍属封建城镇向近代城市的转变。这是一场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演变。贵州因为不沿海、沿边、沿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近代化的启动也就远较中原和沿海地区滞后。

然而,在城市近代化的准备方面,黔中地区却又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令世人惊叹却又不易诠释的表现。其间的原因,大概与贵州这片土地自身的多彩与神奇有关。

人们常说贵州高原多彩、神秘、充满人间传奇。历史上许多看来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贵州这种边远省区的重大事件偏偏发生在贵州。其中如近代贵州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青溪铁厂这一最早以募股形式创办的官商合办企业的落户贵州、近代中国三次革命高潮中贵州总是走在时代前列、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等等。所有这些,从一定角度上讲,对贵州尤其黔中城市的发展都是一种促进。